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01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专题研究 主持人: 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

主持人语: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 其建构的历史经验和相关研究文献都颇为丰赡。自觉的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之历史经验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文化自信和文论自主的双重诉求驱动下, 新时期尤其是 21 世纪初期以来, 学界在研究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现代建构的历史阶段、指导思想、知识体系、思想资源、话语范式、论争缘由、阐释效力及当代价值诸方面, 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组四篇系列论文, 作为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全景展现了这一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特点。王健《探索与论争——1916—1949 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研究综论》、文浩《发展和挫折——1949—1976 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综述》、牟方磊《开放与突破——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回瞻》等三篇论文细致爬梳了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关于 20 世纪前半期(1916—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1949—1976 年)、新时期(1976—2012 年)等三个历史断面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之研究现状; 宁宝剑《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述评》一文, 则对国外学者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之研究现状进行了精心整理。本专题研究从百年文论发展史中钩沉中国经验, 回顾中国现实, 紧扣中国文艺, 凸显中国特色, 彰显中国气派, 冀望其能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重构和创新提供富有价值的参照与启发。

探索与论争

——1916—1949 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研究综论

王 健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型期, 其经历了形成纲领、借鉴西方、自觉建构三个阶段, 并凝聚出对现代文论影响深远的新文学、文体、革命、大众化、现实主义五个关键词; 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研究, 多集中于现代文学的理论定位、理论流变的阐释以及经典概念与文本的阐释三个问题当中。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 新文学; 革命;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01-08

引用格式: 王 健. 探索与论争: 1916—1949 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研究综论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1-8.

收稿日期: 2019-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王 健(1985—), 男, 山东成武人,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新时期思想史。

Discovery and Controversy: Introducing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1916 to 1949

WANG 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o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seen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ormulating many programmes, then learning the methods from the West, at last, constructing theories by the own. During this period, it also brings out five key words, that is New Literature, Literary Form, Revolution, Popularization and Realism, all of them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usually focuses on the topics such a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oretical rheolog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concepts and texts.

Keywords: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culture movement; Marxism; new literature; revolution; popularization

在文学理论日益被理解为一系列学科知识的今天,返回其建构的历史中去,借助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问题的梳理,去寻找在理论建构的变化中被历史遗忘的东西,或许成了我们挣脱原有学科知识束缚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每一次文论的构型也是一次社会事件,都需要我们突破文学理论建构在学科范围内的理解,更加深入到社会价值的层面,审视其在思想转变、社会结构转变中所起到的、或者是想要起到的作用。国内对现代文论的理解,无论其基于何种理论立场,都会将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时间视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形成期。本文也试图通过厘清这段时间文论发展的脉络,将一些已固化为知识的问题重新问题化,使之更容易转换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工作当中来。

一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现代时期的发展特点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开始酝酿。新文化是一场以求新为目标的文化探索运动,文学被视为诊治社会积弊、通达未来生活的良药,而文学理论则是负责为新的文学树立纲领、

确立药方。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主要是一种理想性纲领,其所面临的是理想与实践方法之间的鸿沟,这不仅表现在理论与文学之间,也表现在理论自身的体系建构之中。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矛盾在于理论体系承载不了其所设想的宏大目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裂痕,以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论建构面临的都是为纲领建立体系,以逐渐填补目的与实践之间的裂痕,使之能够承担起引领文学(文化)革命的任务。简言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在1915到1949年间,就是一个确立纲领、勾勒体系的过程。期间虽无明确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用法出现,但鉴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语境,也形成了一套隐性的具有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战时语境的独特性,导致了文论建构纲领和体系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这样,对此时文论建构就无法用时间意义上线性的相互替代关系去概括——它更像是不同空间中不同纲领之间的此消彼长。这种趋势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统一。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一)出现了许多纲领性的文献,促进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探索

这个阶段集中于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它以批

判和改造旧的文学观念开始，承接黄遵宪、梁启超等先贤的呼唤，呼唤建立更加现代的文学乃至文化理论。发表于《新青年》的那些著名文章，包括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都是主张将文学革新作为政治革新、社会革新之手段。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提倡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观念来创作文学，也可被视为一种构想的开端。此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许多纲领性的理论，如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左联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式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其旨在以文学带动社会革命。此时所提出的文论更像是提出新的文学纲领，每一种纲领都呼唤与自己相应的文学与文论体系的形成。它们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所勾勒的体系不同，不是指向对抒情类旧文体的认识，而是指向更具社会切入感的新文学和文化观的建立。

（二）大量新的文学理论教材开始出现，形成了现代文论的体系雏形

这个阶段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贯穿了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一时期，大量新的文学理论教材开始出现，翻译的教材占据了半壁江山。初期以欧美和日本为主，欧美文论如美国人C.T. Winchester的《文学批评原理》（1927年），英国人N. H Hudson的《文学研究法》（1930年）；日本文论如1925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1925年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苏联文论的翻译多了起来，较为著名的有伊佐托夫的《文学修养的基础》（1937年）等。在这些译本的影响下，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教材，学习欧美的如1927年由郁达夫编写的《文学概说》，以及同年由田汉编写的《文学概论》等；以苏联模式为核心的则有1930年由顾凤成编写的《新兴文学概论》等。相比于外国教材，这些文论更多是继承体系，创新之处并不太多，解读的作品也多偏向于外国小说，甚至还出现了照搬其批评观点的现象。此时的文论建构虽从纲领走向了体系，但仍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其不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设想相脱节，也与同时期左联等团体的文化设想相悖，难以承载文化和社会革命的重任。随着抗战的爆发，理论建构

的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基本成型的主要标志

这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后文化中心逐渐转向延安后开始的，它承接纲领与体系之间的裂痕，继续为之寻找行之有效的纲领。此时，经过田汉、顾凤成等人的努力，纲领逐渐发展为一套具有阐释力的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经过左联、抗协等作家团体的传播，已经深入人心。1938年苏联的历史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进入延安，成为干部教育的普及读本。这本教材虽有神化斯大林之嫌，但也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式，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等人的经典文学理论批评文章也陆续被翻译到国内，这激发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形成。

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讨论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加上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些都是中国开始自觉探索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标志。其中《讲话》的意义尤为重大，它涉及文学的根源（现实生活）、功能（推动革命）、对象（工农兵群众）和评价标准（大众化）等理论问题，并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具有重大影响力和阐释力。可以说，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基本成型的主要标志。在此之后，1943年蔡仪编写的《新艺术论》，1947年林焕平编写的《文学论教程》，都已非常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国文论了。其不同于第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性、党派性等优先性的强调，标志着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

二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现代时期的关键词与历史借鉴

进入现代世界秩序的迫切要求激发了文学纲领的创新，而贯穿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30余年接连不断的战争，包括革命、抗日和解放

战争,都对此时的文学理论构建工作提出了要求。很多时候它需要与反封建、反侵略与反压迫等时代任务结合在一起。这些任务影响了文论构建对国外文论的学习与甄别、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消化,它既形成了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构筑了理论本身的特色。概言之,这一时期的文论建构经历了从西方理论的多元探索到马克思主义的一元统一、从提出纲领到形成体系的过程。本文将以对这一时期理论构建五个关键词的分析作为线索,力争对其所形成的历史遗产进行系统梳理。

关键词一:新文学

对现代文学理论的需求脱胎于五四时期所形成的新与旧的对立逻辑中。新是求新,即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呼唤新的文学理念去改造旧的文化样态。此时引介的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理论对于新文学的阐释是:“有活泼的文学,便是有活泼的国民;在文学已死的时候,国民性的精神是不可能独生的。”^[1]文学革新背后是文学目的的革新,这一点贯穿于这一时代。周作人在1918年《人的文学》中强调的是个人本位,成仿吾在1923年《新文学之使命》中所强调的是心灵的革新:“我们这运动的目的,在使我们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2]1930年左联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式及我们的任务》中所说打破资本主义文学垄断、积极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新任务,其旨都着眼于新的未来之探索。尽管其所强调的未来目标不同,但每一种新的文学纲领背后都贯穿着求新的目的,新文学的理论即未来社会理论。对未来维度的强调为历史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式,赋予文学建构以动态感。

关键词二:文体

文体的变革与诸多文学纲领的出现相关,其目的就在于改造文体,为纲领寻找文学的实践形式。五四时期白话的兴盛也刺激了现代文体的变革,其中最著名的是新诗革命。胡适在1919年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所说:“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3]除胡适外,废名1934年的《新诗问答》,九叶派1947年发表的《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也都试图为诗歌创

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其与对未来维度的开拓相符合,并能够在现实批判的层面承担起责任。同理,还有小说、散文等文体的改革。鲁迅曾撰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从史论角度为小说作为单独文体正名;他还在1933年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谈过小品文的改革:“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4]这一时期的问题革命让新文学的纲领拓展到了形式改革的层面,形式革新即其所探索的内容革新。

关键词三:革命

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文学革命是五四以来的主潮,它表现在文体改革的层面,而革命文学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有关。随着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文学逐渐也形成了自己的纲领:左联在1931年发表了《革命作家国际联盟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一文,文中呼唤其成员要以革命作家的身份创作符合革命需要的文学,即与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相一致的文学。周扬在1932年《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学论辩》中提出:“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推进今后世界的文学,把文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5]如果说文学革命号召的是文化意义上的革命,那么革命文学号召的则是用文学的动员力量建立起政治的革命。自此,文学理论构建就进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形成了以革命为核心的理论范畴,它包括对文学定义(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范畴(包括本质论、功能论和批评方法论)的确立。到蔡仪1943年出版《新艺术论》时,革命已经成为了一个颇为成熟的文论体系了。

关键词四:大众化

大众化是革命文学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它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动员机制,并在1937年以来全民抗战中被发扬光大。文学大众化影响了文学对象论与功能论的定义,回应了文学为谁而写、写了何用的问题。它源自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文艺不是少数统治阶级所专有,而是要为更多数普通大众所服务。1932年左右在中国兴起了一股讨论大众文艺的热潮,茅盾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周扬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

都在探索如何调动各种文学创作方式，以“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毛泽东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进一步确立了这项准则，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852}。相比以往讨论，毛泽东没有涉及到对外国小说的分析，而是切实针对抗战的需要与延安的实际情况来阐述这项准则。相比于此时流行的苏联“拉普”文论，毛泽东重视联合胜过对抗，重视普及胜过教育，这种阐述也构成了文学理论建构中较为有中国特色的部分。

关键词五：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构建的重要门径。此时的现实主义不只是一个文学概念，其背后有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体系的支撑，它与两个子概念息息相关。第一个是阶级。以阶级斗争作为认识现实问题的途径，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对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式有关。周扬在 1936 年的《现实主义试论》一文中断定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以现代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他眼中正确的世界观即阶级论。经由这些判断，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便长期和阶级斗争论捆在一起了。第二个是典型。毛泽东在《讲话》中曾说：“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6]863}典型论长期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在现实主义文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当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是毫无争议的，比如对典型问题，最著名的争论即来自于周扬与胡风之间，这与胡风理解现实主义的方式有关：他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1941 年）的一文中，将现实主义立于人的主观认识层面，认为作家主观思想对错误路线的克服即“现实主义的斗争”，这和周扬等理论家立足于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谈现实主义的方法大相径庭。这些争论形成了中国特色文论建构史中丰富且复杂的部分。

五个关键词体现的是文论建构的未来维度，文体蕴含的是理论纲领的形式探索，革命承载的是历史中文论建构中的背景转换，大众化展露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的主要特色，而对现实主义的探索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建

构的核心门径。因此，它们是我们叩访中国近代史、思考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途径所在，其背后隐含的是历史中所形成的关于文论思考的结构性思维。这一阶段文论发展对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作出了以下贡献：

第一，初步确立了现代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首先，在知识点构建的层面，这一时期的讨论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确立贡献了大量的话题，如现实主义、革命、典型等。其次在文学理论体系模型的构建层面，以革命为核心的文论框架此时初步形成。季水河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文中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认为此时形成的对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构成论和接受论的区分，形成了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框架。革命的核心可以被置换，但这套文论模型却大体被继承下来，构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雏形。再次从体系综合的层面看，这个层面重视的是构建的方法，它不是靠排斥而是靠重新的阐释和综合，通过体系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中西方理论汇为一体并进行排序，将几者之间的问题转化为情感与理性、浪漫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等概念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的体系探索为我们的理论建设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尝试。

第二，对文学的社会启蒙及动员作用的强调。这也是对文学理论“群”功能的彰显。这里“群”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意思即组织和发动群众，它与这一时期的战争状态相关，在《讲话》后更是被确立为文学的核心功能。这不仅是文学理论建构的时代特色，也是理论构建对中国古典资源的一次转化：群居切磋，和而不流。对“群”的强调丰富了文学的功能论，扩大了文学读者的群体，也直接关联起了理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的一些可贵的理论尝试，比如大众化、典型理论等，都构筑了当代文论的核心内涵，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较有特色的部分。

第三，开拓了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引领而非阐释的功能。新的文学纲领不仅确立了与自身相应的体系，也引导了一系列符合其体系的创作思潮。理论对新的文学创作的引领在五四时期就出现了诸多构想，随着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这些设想也逐渐都落实到了实践之中。文艺大众

化的运动便是一个例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大量通俗作品如街头剧、报告文学、赵树理等人的农村小说,都是在理论要求和文学创作的深层互动中产生的。由文艺大众化所形成的一系列讨论,比如通俗化,反对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等,也都能为理论如何引领创作的方法提供借鉴。此时文艺大众化也深刻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建构体系,使理论不再简单地服务于对文学创作的指导,而是有意识地开始甄别甚至创造文学的类别,引领文学创作走向新的路径。

概言之,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的文学理论建设还处于探索与争论期。理论的建设起源于对新文化的探索,理论家们在新旧转化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各式各样的文学纲领,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这些纲领构建体系并尝试着对那时的文学创作思潮有所引导。30余年的时间里,文学理论的建构史呈现出了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从多元走向统一的发展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论由左联和解放区开始走向全国,并吸纳了其他理论的特色,最终形成了一套更有效的文学阐释体系。虽有对苏联的学习,但此时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理论特征是对集体性的强调,这与理论所扮演的动员角色密切相关。此时的理论是生长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它需要面向社会需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集体性既构成了文论建构的特色,也是其缺陷所在:它首先表现为对文学的内部问题研究显得不足,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部分几乎没有涉及;其次是理论问题会与政治问题纠缠不清。文学理论脱胎于政治需要,也与政治争论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比如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等。这导致以阶级立场作为判定问题的标准,并由此将先进与反动、集体与个人的对立关系简单地移植到理论中来,给未来的文学理论建构工作埋下了隐患。如何在避免隐患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将历史遗产转换到中国当下的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中来,这无疑是一项有难度的任务。

三 对现代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进行研究之成果与所涉问题

涉及到对中国文学理论史构建做整体性研究

的书主要有5本,分别是:许道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著《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程正民、程凯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傅莹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对五四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段的文学理论史做专项研究的作品主要有6册,分别是:蓝海著《中国抗战文艺史》;庄锡华著《中国现代文论家论》;李夫生著《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1919—1949)》;权绘锦著《20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黄健著《民国文化与民国文论》;胡海、杨青芝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大争议问题探析》;张武军著《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文论选本主要有3部,分别为:陈思和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陈雪虎主编《中国现代文论新编》;许觉民、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论》(上下册)。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4篇,分为是:王婉秋著《西方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1917—1937》(吉林大学);刘恋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三十年——以十三部讲义为对象的研究》(扬州大学);傅莹著《中国20世纪上半叶文学理论的发轫与演变》(暨南大学);刘雄平著《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1928—1936)》(暨南大学)。单篇论文数量众多,无法逐一胪列,其中重要的篇章将在下文的论述中提及。这些成果所论述的问题以及在问题中有待继续探讨的方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定位问题的思考。所有前期成果中,对文学理论的论述都是放在古与今的对立逻辑中进行的,其区别只是这个“今”定位在哪个时段。一些观点将落脚点放在对欧美文论的学习上,理由在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建构对欧美、日本的学习非常多,大量教材都是模仿欧美、日本的教材体系。程正民、程凯将1910年到1949年的这一时段定位为现代文论的形成期,认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文论建构经历了由中国向西方的转变;杜书瀛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成型期》里持类似观点,认为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积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争论已经从古典的诗文之争转向了现代文论的

内部论争。除了他们之外，刘雄平、王婉秋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另一些学者将起源定位于苏联文论。他们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能够摆脱照搬西方模式、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对苏联文论的继承与超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傅莹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普洛列塔利亚”上，她认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是苏联文论融合了欧美文论后的产物。对左翼文论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研究的学者多半也持有类似观点。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起源安置到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形成的节点上。毛庆耆等人就立足于教材的变化来探讨现代文论的形成，他们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形成的开端。笔者认同毛庆耆等人以《讲话》作为起点的观点。不同的起点设置体现出的是不同的研究重心，笔者所强调的落脚点不是对国外文论的接受和学习，而是在学习中所出现的带有时代色彩的异质性内容，这些内容就构成了文学建构中包含了中国特色的部分。

本着对异质性内容的探索，从前期成果中所能够被开拓的空间在于：我们并不止于从文学理论体系及知识点变化的角度审视其发展历程，而是关注其理论纲领和体系建构之间、理论建设与文学创作之间、理论体系的生成与现实语境的制约之间更为复杂的层面，无论是欧美、日本还是苏联的文论，对它们的接受都需要在这些层面中进行考察。将研究视角放在诸多层面形成的张力之间，无疑能将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剖析得更细致、也更加现实化，因此也能够更有效地将这些历史经验转化到对当下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工作上来。

其二是对历史中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发展作出阐释。从五四时期大量的理论纲领的涌现，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向统一的结局，这其中的历程本就有很多可以阐释的空间。有些成果是以关键词或关键教材为核心去梳理流变的，杜书瀛、程正民、毛庆耆、傅莹等人的著作都是如此。除此之外，古风的《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文学评论》，2001 年第 5 期）、杨春时的《新时期文论的变革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等论文也是类似做法。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是立足于某项文论的建构来对发展史进行概述的，比如李夫生

的《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1919—1949）》（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胡海、杨青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大争议问题探析》（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年）都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作为切入点。季水河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谭好哲的《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等论文采取的也是这一角度。而权绘锦的《20 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年），张武军的《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中华书局，2013 年）则是侧重于从左翼文论的视角梳理流变。这些成果在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强大阐释力的同时，也都普遍意识到了政治在文论统一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 世纪 30 年代抗战的爆发，让很多学者暂停了对文学革命的思考，而是转而认同在革命的层面上重新建构文学的意义。在这个转变的基础上，文学本质的话语就从思想转向了意识形态，表现的技巧也从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这些转变后的文论观念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统一了起来，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构成了其最为核心的概念，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庞大的文论体系。

笔者认同前述成果所描述的转变主线，但同时也认为这些成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是其过于强调在转变当中政治所起到的作用。文论建构从多元走向统一，政治推广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理论纲领和体系自身的吸引力也不可忽视。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大众化的要求，它提倡的是动员而非强制，当时在这一观点影响下，也确实出现了大量符合政治要求但也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后者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决策、刺激文论的建构。文学大众化运动中，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本就是政治、文学与大众深度互动的产物，如果将视野过度集中于政治，对互动性的探索就会稍显不足。其次是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未能得到更有效的重视。文论建构的意义并不止于文学以及国家政治建设，其还有对社会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即伦理意义上“群”的功能。理论需要指引文学创作承担起对社会、民族共同体的黏

合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实践性的。谈大众是个理论问题,但具体面对怎样的大众就是个实践问题了。战时的语境将实践性的特点充分放大,其对社会进行聚合的经验至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其三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关键问题或经典文本进行剖析。如文论的现代性这一关键问题,刘雄平、刘恋的论文对此话题都有涉及。具体到对一些理论内部问题的争论则更多,比如关于典型的话题,相关的论文就有邱运华的《现代中国文论建设过程中的高尔基典型论——30年代周扬、胡风之争与典型说论辨》、傅莹的《在文学本体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二十世纪中国典型理论影响研究》等。对经典文本的剖析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对《讲话》的解读:在毛庆著的论述中,《讲话》被看作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起点。谭好哲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一文中,从确立马克思的基本文艺观、在实践层面上确立党的基本文艺方针的领导作用以及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三个层面阐释了《讲话》对文学理论的建构价值;陈晓明在《曲折与激变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变异》一文中认为,《讲话》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将革命和文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刘卓的《作为文学理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则是从读者的角度去理解“文艺为工农兵”的思想,强调作为读者的工农兵的出现起到了转变时代文艺标准的作用,并认为这是《讲话》之所以能够通向现代文论的地方。赵炎秋的《重视普及与呼唤精品——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将两个“讲话”的意义放置到普及与提高、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一元与多元的结构矛盾中去解读,强调的是理论

对文学创作认知现实和指引社会层面的指导作用。

将这一类前期成果安置到中国特色文论的未来建构中的重中之重,在于如何处理好话题的点和历史的面之间的联系,杜书瀛、程正民等学者对此都做了可贵的尝试。笔者认为,未来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研究,应该更加强调理论建构的当下性意义。将来研究的重点也不仅仅是为了要把近代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历史建构梳理清楚——在这个层面上许多的前期成果都做了出色的工作,而是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途径,将所探索的历史经验转化到我国当下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建设工作之中来。强调当下性,强调服务于当下,这是回顾中国特色文论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当下文学理论建构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科的内部问题,它本身就是社会文化问题表现出的某种结果。我们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的回顾并不是止于当下,而是要将当下作为起点,期待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 [1] 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M].章锡琛,译.上海:开明书店,1925:125.
- [2]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J].创造周报,1923,5(2):1.
- [3]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M]//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95.
- [4]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2-593.
- [5] 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6.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责任编辑:黄声波